

黄河金石录

左慧元 編



黄河水利出版社

黄河金石錄

左慧元 編



黄河水利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黄河金石录/左慧元编. —郑州:黄河水利出版社,
1999.11

ISBN 7-80621-292-2

I. 黄… II. 左… III. 金石—黄河流域
IV. K877.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1999)第 47917 号

责任编辑:韩美琴

封面设计:郭琦

责任印制:温红建

出版发行:黄河水利出版社

地址:河南省郑州市顺河路黄委会综合楼 12 层 邮编:450003

E-mail:yrp@public2.zz.ha.cn

发行部电话:(0371)6302620 传真:6302219

印 刷:黄河水利委员会印刷厂

开	本:850mm×1168mm 1/32	印	张:15.875
版	别:1999 年 11 月 第 1 版	印	数:1—1100
印	次:1999 年 11 月 郑州第 1 次印刷	字	数:400 千字

定 价:48.00 元



左慧元 河南開封市人，回族，1948年5月生。求學於北京師範學院，供職水利部黃河水利委員會，任黃河檔案館副研究館員。多年熱衷黃河水利碑刻的收集整理，致力黃河水利史、水文化研究。撰寫發表水文化、水利史文章數十萬字，論文多次獲獎并收入《中國科學技術文庫》等相關論文集；參與大型志書《黃河志》、辭書《黃河文化百科》等的編撰工作；主持編輯《王化雲治河文集》、《黃河的兒子》等書。

序

千百年來，黃河出崑崙，繞積石，穿峽谷，躍龍門，跨平原，滾滾東流，一瀉千里。黃河流域如同一只鉅大的搖籃，中華民族的先民們在她的懷抱里，吮吸着黃河母親的乳汁、生息繁衍，創造了燦爛的文化，創造了中華歷史文明。

有文字記載特別是春秋戰國以來，黃河流域廣大的中下游地區經濟已十分發達，以農業為主體的社會經濟得到了長足的發展。黃河兩岸民衆在同自然災害包括黃河洪水災害長期鬥爭的同時，不斷地開發利用黃河水資源，尤其注重發展農田水利灌溉。我國最早的灌溉工程，首推黃河流域的漉池（在今陝西省咸陽市西南），《詩經》中就有『漉池北流，浸彼稻田』的記載。到了戰國初年，黃河流域開始出現大型引水灌溉工程。魏文侯任西門豹爲鄴（今河北省磁縣、臨安一帶）令，在黃河支流漳河上修築了十二渠，引漳灌溉農田。之後，秦國在關中興建了鄭國渠，引涇河水灌溉農田，於是關中爲沃野，無凶年，秦卒以富強。在黃河的湟水流域，寧蒙河套平原，陝西的洛河、渭河流域，山西的汾河流域，河南的沁水、丹河流域等引水灌溉事業層出不窮、推陳出新。由於黃

河兩岸人民充分利用黃河幹支流水利資源，發展農田灌溉，為農業生產的發展提供了有力的保障。以農為本的泱泱中華屹立於世界東方。黃河之於中華民族功績赫赫。

由於黃河多泥沙的特點，黃河下游時常泛濫成災，北到津沽、南到江淮，包括河南、河北、山東、安徽、江蘇等省在內的廣大地區幾乎年年受到黃河洪水的威脅和破壞。面對黃河一年年、一次次造成的災害，黃河兩岸人民與黃河進行了千百次的鬥爭。從傳說中的大禹治水導河入海，漢代賈讓治河『三策』，明代潘季馴『東水攻沙』到今天人民治理黃河，都在積極探索如何更好地利用黃河豐富的水沙資源造福人民，想方設法治理黃河的危害。黃河的歷史是一部災害的歷史，是中華先民們不斷與之鬥爭的歷史，也是不斷利用黃河水沙資源、造福中華民族的歷史。勤勞智慧的黃河兩岸人民不斷鬥爭，不斷總結，不斷認識。人們往往把黃河發生的災害、進行的治理、開展的利用等情況刊刻在碑石上、鐵銅器物上，以傳後世。長期以來形成了分佈廣泛、數量繁多、內容豐富的黃河金石。這是先民們留給後人的寶貴文化遺產，是先民們智慧的結晶。

《黃河金石錄》收集了歷代有關黃河河勢、水情、災害、治理、利用等內容的金石碑刻二百餘通，包括有西漢、唐、宋、金、元、明、清以及民國各個時期刊刻樹立的碑石。這些碑石涵蓋了黃河幹流上中下游、泛區以及諸如湟水、涇河、汾河、沁河、大汶河等支流廣大地區，若干金石真切地記述了黃河變遷的歷史。這些碑刻都記載了真實可信的史料。正如宋代著名金石收藏家趙明誠所論：『蓋史牒出於後人之手，不能無失；而刻

詞當時所立，可信不疑。』可以正訛謬，有功於後學。』縱覽《黃河金石錄》，篇篇碑文淋漓盡致地展現出斯時斯地黃河的肆虐和黃河兩岸先民們治理黃河、開發利用水資源活動的歷史。它以多角度記載了黃河不同地域、不同時期的洪水、災害，記述了流域內不同地區人民開發利用黃河水利資源、引水灌溉的艱辛過程；還反映了黃河航運、水利工程等情形；大量地記載和反映了先民們在認識黃河和治理黃河的過程中形成的治河思想、治河方略和技術；客觀地印證了史籍典章所載內容，也對史書不記做了補充。由於自然的原因和人為的因素，黃河兩岸遺留下的古代刻碑，不斷遭受毀壞，寶貴史料受到損失。

黃河自源頭到入海口流經九省（區），並且歷史上在黃淮海大平原上遷徙無常，各地立存的碑刻非常分散，不便於利用研究。《黃河金石錄》主要收錄各地現存碑刻，同時也收錄了一定數量的失存碑刻的碑文。作者對每一通碑文，均精心進行標注，交待了碑刻的背景材料，便於閱讀。我認為這部《黃河金石錄》為進一步認識黃河、研究黃河提供了頗有價值的歷史資料，是難能可貴的。

徐福齡

一九九九年六月

黃河文化的奇葩

左慧元

黃河金石碑刻是黃河文化百花園中一朵鮮艷奪目的奇葩，它以獨特的文化形式展示其風采，洋溢着深厚的文化魅力。黃河金石融注了歷代勞動者杰出的科學才能和聰穎的文化稟賦。數千年來，從巴顏喀拉到渤海之濱，黃河流經的廣大地區，先人刻立了難以計數的金石碑刻。《黃河金石錄》收錄了與黃河河勢、水情、災害、利用、治理等有關的金石碑文二百餘通（件），包括西漢、唐、宋、金、元、明、清以及民國各個時期刊刻的碑石器物。這些金石以其真實可信的史料價值，淋漓盡致地展現了斯時斯地黃河的肆虐情況和黃河兩岸先民們治理黃河、開發利用水資源的歷史。

一、黃河金石是黃河文化的有機組成

據史料記載，大約三千年前的殷周時期，古人便開始在古器物上銘刻文字，記錄當時社會某些方面的狀況。東漢以後樹立墓碑風氣盛行，紀事寓戒，蔚然成風。北魏以後金石內容大為擴展，除墓誌外，大量記事、頌功、契約、經典文章為其主要內容。其中有一定數量的金石記載和反映了黃河的歷史足蹟。

黃河金石在形成時間和分佈空間位置上有明顯的延續性和廣泛性，都與黃河和黃河流域的社會生活有密不可分的內在關聯。如果從上古傳說中的大禹治水爲治河開端，至今已有一千多年的可歌可泣的歷史。黃河先民們與黃河的抗爭史實，在今可見的黃河金石中或多或少都有所反映。鐫刻在長沙湘江西岸岳麓山峰頂石崖上的《禹王碑》（也稱《岫嶽碑》），沿黃各地的禹廟多有其摹翻刻石。雖然我們對此碑爲夏禹治水時所刻這一觀點持否定態度，但其畢竟是記載華夏先民最早治河治水活動的刻石，通過七十二個非甲骨、非鐘鼎、非篆、非隸的奇特的字符，我們不難體會到古人治河治水的艱辛和矢志不渝的精神。秦漢以來，隨墓碑刻的興起，黃河金石也逢時而長。僅漢代桑欽撰的《水經》（北魏酈道元注）中涉及到黃河及支流的碑刻就近百通。隨着社會政治經濟的發展，黃河金石更多地被人們利用記載治河的實踐。宋代以後各代金石學家搜集著錄的金石碑刻如宋趙明誠的《金石錄》、元潘昂霄的《金石例》、明楊慎之的《金石古文》、清王昶的《金石粹編》等，均收錄有與黃河有關的金石。遺憾的是，明清以前的黃河金石實物已很少見，多爲拓片或著錄的銘文，現存的黃河金石真蹟多爲明、清兩代的。黃河兩岸近代記事、頌德等碑石也不罕見。黃河金石有一個連續不斷產生的過程，人們出於不同目的在不同時期對不同地域不同範圍的治河活動做了真實的記載。如果按時間順序把黃河金石排列起來，就是一部系統的包含衆多細節的黃河編年史，其延續性是顯而易見的。黃河金石的地理空間分佈十分廣泛，且與各地社會生活呈相

應關系。從青藏高原到甘川谷地，從河套灌區到『八百里秦川』，從天險禹門口到東岳泰山，從千里黃河大堤到黃沙流淌的黃河泛區，都有黃河金石的踪蹟。其分佈有三個很突出的集中點。一是黃河開發利用比較早、有一定效益的地區，如關中平原、河套灌區、湟水流域、汾河流域、沁河流域等。僅沁河流域就留存有數十通有關治理沁河、引沁灌溉的刻石。沁河上源五龍口是引沁諸渠引水口，此處目前存世碑刻就有《沁河枋口廣濟渠天成山蘭若記》（唐）、《千倉渠水利奏立科條碑記》（宋）、《鑿山創河記》（明）、《重修永利河序》（清）等。下游嘉應觀及其附近還有帝王、重臣、地方官吏、士紳村民刻立的黃河碑刻數十通。二是黃河災害頻繁發生的地區，如下游的河南、山東及河北部分地區、黃運交匯地區等。從河南鄭州花園口到黃河銅瓦廂改道的蘭考，是黃河三年兩決、災害連年的地區，僅這一段南岸清代記載黃河決口的碑石近十通，如《榮澤八堡碑》、《鄭工合龍處碑》、《中牟楊橋河神祠碑》、《黃陵崗塞河工完之碑》等等。三是社會經濟文化比較發達地區，如由長安起點的『絲綢之路』上的西安、天水、永靖等地。甘肅永靖縣是古絲綢之路通往西域的必經之地，在傍依黃河的炳靈寺附近，摩崖刻石比比皆是，其文字多記載着當年的繁榮，頌嘆黃河的雄渾和民族文化的昌盛。

黃河孕育了五千年的華夏文明，與延續數千年的政治、經濟發展的同步，形成了多姿多采的黃河文化，以其豐厚的內涵昭示了民族的文明。由於黃河流域是中華民族政治、經濟、文化的中心，黃河金石產生時間序列之長、分佈之廣泛是其他江河和地區不

可比擬的，有其獨特的生成和生存環境。黃河金石與黃河文化，民族文明發展、延續有着內在的邏輯關聯。黃河文化孕育和促進了黃河金石的產生並促進其發展，黃河金石以其博大精深的文化屬性豐富了黃河文化的內涵。黃河金石是黃河流域先民對民族文明的忠實記錄，是黃河文化的有機組成。縱觀黃河金石的歷史，也是黃河文化發展的歷史。不同時期的黃河金石記載的有關政治、經濟、軍事、哲學、文化等豐富多彩的內容，給社會的發展、民族的文明增添了光彩。

二、黃河金石是黃河災害、治理和利用的歷史記錄

黃河以害河聞名於世。如同一切事物都具有兩面性一樣，多少年來人們也在探索利用其豐富的水沙資源，想方設法治理其危害。黃河的歷史可以看作是災害的歷史，也是人們利用和治理的歷史。黃河金石因其『刻詞當時所立，可信不疑』，為後代提供了確實的有關黃河災害、堤防工程、灌溉、航運等方面的史料。

黃河的洪水災害，在傳說的唐虞夏三代就時有發生，『湯湯洪水方割，蕩蕩懷山襄陵，浩浩滔天，下民其咨』；『洪水橫流，泛濫於天下』。歷經數代，才由禹『開九州、通九道、陂九澤、度九山』，決江疏河，水勢一平。然而黃河多沙、善淤、善決、善徙給黃河流域造成的災害不可計數。自周定王五年（公元前六〇二年）到一九三八年花園口決堤的二千五百四十年間，黃河洪水橫流，決口泛濫年份有五百四十三年之多，災害範圍之

廣、災情之嚴重令世人驚駭。記載黃河洪水災害，是黃河金石的主要內容之一。

宋代著名詞人蘇轍曾做《黃樓賦》，刻石立存徐州雲臺山。《黃樓賦》淋漓盡致地描畫了北宋熙寧十年（公元一〇七七年），黃河溢決澶淵（今河南濮陽）的悲慘景象，『灌郡縣四十五』、『壞田逾三萬頃』、『水及彭城（今徐州）』、『水之淫也，淤漫子餘里，漂廬舍、敗冢墓，老弱蔽川而下……槁死於丘陵林木之上』。當時徐州太守蘇軾率衆抗洪，方使徐州免遭滅頂之災。此碑雖是蘇轍爲其兄歌功頌德，字里行間也透視出此次洪水淹沒之廣，百姓受害之重，寫出了黃河這條蛟龍南滾北侵肆虐的特性。

明代弘治二年（公元一四八九年），黃河從開封城東北潰決，過沁水溢流爲二。一股入淮河，一股入張秋運河，『所至壞民田廬，且勢損南北運道』。過了四年『大雨霖，河流盛聚』，決運河東岸，『漕舟阻絕』，明代交通大動脈陷於癱瘓。明孝宗先後命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劉大夏、太監李興、平江伯陳銳前往治理。動用民工五萬餘人，疏河道，築長堤，以保漕運。工成後，在開封東北儀封（今蘭考）黃陵崗村刻立《黃陵崗塞河功完之碑》，記載這次水災和治理情況，碑文中可見封建統治者對黃河危及漕運之惶惶心情，說明黃河與明代政治、經濟和社會生活息息相關。

現存鄭州黃河博物館的《中牟楊橋河神祠碑》（俗稱楊橋御碑），以精煉文字記載了清乾隆二十六年（公元一七六一年）黃河下游一次特大洪水。當年七月，三門峽到鄭州花園口普降暴雨，『黃水處處漲，芟楫難爲備。遙堤不能容，子堰徒成棄』。黃河洪水與

沁河洪水相遇，造成堤防潰決。中牟楊橋決口數百丈，洪水直趨賈魯河，災情十分嚴重，朝廷上下一片震驚，雖歷經數月，楊橋決口合龍，但這場洪水中河南十二個州縣被水衝，山東二個州縣、安徽四個州縣被淹，災民無數，損失無算。乾隆皇帝親撰碑文，歷叙河決及治理狀況。在碑陰鐫刻《豫河誌事詩》三首，分別以五言、七言韻文，表達對河災的恐懼和治理成功的欣慰。此碑歷經二百餘年的風風雨雨，斑剝的碑石永示後人，是三門峽至花園口特大洪水的歷史見證。

僅此數通碑石，可見黃河災害一斑。千里『懸河』虎視中原，在北至天津、南達江淮二十五萬平方公里的大平原上，黃河洪水災害連年，記載黃河災害的碑石林立，黃河金石中可見『尸殍四野』、『赤地千里，餓殍載道』的悲慘記載。活生生、血淋淋的金石文字描繪了民生之昏墊、國計之梗阻。黃河金石暴露了黃河災害的方方面面，給後人刻畫了一幅悲慘的歷史畫面，為後世了解黃河的歷史，認識黃河的洪水，提供了確實的資料，是黃河治理開發利用的借鑒。

黃河金石在下游防洪工程的記載中突出地凸現黃河堤防的歷史。黃河堤防的出現是治河活動的一大發展，也是下游人民防洪的主要措施，黃河金石記載『水上長城』的豐功偉績，內容頗豐。

黃河堤防自古有之，明代黃河下游堤防有長足發展。有不少刻石對潘季馴『堅築堤防』、『以堤束水，以水攻沙』主張多有涉及，對當時不同類型的遙堤、格堤、月堤、縷堤

的建築模式、作用均有記載，並從理論上闡述各式堤防修建技術、功能作用等，這些記載是了解明代及其以前堤防格局有價值的史料，對歷史文獻有有效的印證作用。

清咸豐五年（公元一八五五年）銅瓦廂決口改道，口門至張秋鎮二百多公里河段無官修大堤。斷斷續續的民埝無力抗禦伏秋大汛。清光緒元年（公元一八七五年），山東巡撫丁寶楨費帑銀五十四萬餘兩，修築西起東明縣謝家莊，東迄東平縣十里鋪，『蜿蜒二百五十餘里黃河南岸大堤』，名『障東堤』，『庶幾民安其居，運道永固』。工成後，丁寶楨親自撰寫《新築障東堤記》刊刻立石，以誌此次修堤史實。又《山東黃河上游南岸民埝紀念碑》，歷述了障東堤修築後爲保鄆城等縣河灘民田，當地紳民聚資修建一百五十里民埝的前後經過及『埝內百餘里無昏墊』之作用。此兩碑所記的官堤、民埝在一九四六年黃河歸故後，聯結成一體，演變爲今黃河大堤。兩碑是研究現行河道南大堤形成的原因、過程、功能的可靠資料。

每當黃河決溢，口門上下堤防被衝得千瘡百孔，堵復後常立石紀之。《黃陵崗塞河功完之碑》（明）、《鐵犀銘》（明）、《鄭工合龍處碑》（清）、《榮澤大工紀工碑》（清）、《培修金堤紀念碑》（民國）、《董莊堵口合龍碑》（民國）等均向人們提供了當時災害造成堤防破壞的情況和堵決工程等史料。

著名的立於安徽碭山城北故黃河大堤旁的《治河條例碑》碑文，是清河道總督張鵬翮於康熙三十九年六月十七日的奏折。奏折詳盡地分折了河工諸情弊，如『土堤皆用

虛土堆成』、『石工修砌不堅』、『挑河不挑挖深通』、『帑多虛糜、工無實效』等，提出了一系列河工措施，如『堤工之宜堅築』、『椿工之宜用整木』、『龍尾埽之宜停』、『石工之修砌宜得法』等等，得到康熙帝的贊同。該碑總結了長期以來勞動人民修治黃河堤防的經驗，是一個時期內勞動人民智慧的結晶，至今對下游堤防的管理仍有積極的借鑒作用。

黃河金石突出地記述了不同地域人民開發利用黃河水利資源、引水灌溉的艱辛過程。

公元前四〇〇年，西門豹引漳河（黃河支流）十二渠創修後，黃河流域灌溉事業漸次發展。譽稱『天下黃河富寧夏』的河套灌區有秦渠、漢渠，號稱『八百里秦川』的關中平原，有鄭國渠等引涇灌渠；青海黃湟水谷地有湟水諸渠；沁河有古老的枋口渠；以至下游的鴻溝、通濟渠，大小渠道縱橫不可勝數。先民在避水害的同時，也利用黃河豐富水利資源，灌溉着廣袤的沃野。黃河金石為後人提供了引黃灌溉的真實史料。

明嘉靖十一年（公元一五三二年），中順大夫南京通政司右通政馬理撰文書丹《重修涇川五渠記碑》，洋洋兩千餘字，除記載都御史劉天和修鑿通濟渠史實外，以簡練的文筆記述了戰國末年始修鄭國渠引涇灌溉、漢代修白公渠、宋代修豐利渠、元代修王御史渠（新渠）、明代修廣惠渠等情況。碑文記載了諸渠修建原因、施工時間、工程規模、灌溉效益以及勘測、施工、管理等方面的經驗與問題。該碑可以認為是自秦始皇元年（前246年）到明嘉靖年間近一千八百年的引涇灌溉的總結，給人們展現了引涇的歷史長卷，頌揚了

關中民衆在社會生產力低下的情況下，前僕後繼，發揮聰明才智，不斷延伸引涇渠道，擴大灌溉面積的進取精神。《廣惠渠記碑》（明）、《通濟渠記碑》（明）、《龍洞渠記碑》（清）、《涇惠渠頌並序碑》（民國）等刻石，無不記載引涇規模之擴大、工程之宏偉、施工之艱辛、民衆之智慧。

在其他引黃灌區也留下了大量的刻石，如寧夏《中衛美利渠記》（明）、《修唐徕渠碑記》（清）、《七星渠碑記》（清）、《建惠農渠碑》（清）、《新建雲亭渠碑記》（民國）、沁河灌區的《鑿山創河記碑》（明）、《重修濟水千倉渠碑》（清）、汾河流域的《新修洪山泉源記》（明）、《烈石渠記碑》（明）、《晉祠水利記功碑》（清）、《重修三河水平記》（清），下游的《開歸陳汝四郡河圖碑》（清）、《柳園口吸水機記碑》（民國）等等。大量的金石記錄了勤勞勇敢的黃河兩岸人民，憑着智慧和雙手與修灌漑工程，使黃河造福於一方的歷史事實。

值得稱道的是，在不少灌區還有大量的有關水政管理方面的碑石，《千倉渠水利奏立科條碑》（宋）、《都總管鎮國定兩縣水碑》（金）、《太原水利禁令公文碑》（明）、《瓜峪口圖說碑》（明）、《建霍渠分水鐵柵圖碑》（清）等碑，一方面記述了河道管理、水量分配、水糧關係、懲罰制度，另一方面還記述了與之有關的工程措施。從中可以看到古人對黃河水資源的重視和積極開發利用的願望與實踐，顯示了古老的黃河文化。

黃河的航運是黃河金石反映的又一方面內容。戰國中期，魏惠王就開挖通黃淮的水運工程——鴻溝，隋唐以來，黃河漕運地位愈發引起統治者的重視。歷代的經營形

成以西安、洛陽、開封爲中心，以黃河爲骨干的江、淮、河、運、海龐大的水運網，成了我國歷史上相當長時期的經濟動脈。

由於黃河多沙少水的特性，歷代尤其重視黃、運航道的治理利用，投入鉅大人力物力，採取了衆多的工程措施。山東東平縣東三十公里的汶河上的戴村壩，是明清時期漕運的關鍵工程。立存戴村壩址的《重修東平州戴村壩碑》、《重修玲瓏壩碑》、《寶公堤碑》等，細致地記載了明清時期的『引汶濟運』工程。據碑文記載，明永樂九年（公元一四一一年），尚書宋禮採納了白英老人的意見『遏濟入海，使趨南旺』，修『五里土堤』。明、清兩代擴建戴村壩工程，橫攔汶水，分流南北以濟漕運，使汶水『七分朝天子，三分下江南』。碑文還對這一引水工程的浩大工程量、技術複雜性及其修建、維護、改建、擴建與效益有詳細記載，字里行間顯露出人們在實踐中適應自然從而利用自然的知識和能力。戴村壩是人工建築與自然力交互作用的成果，表明明清時期水工技術達到了相當的水平。

黃河金石是反映黃河的災害、利用、治理的『第一手資料』，許多碑石印證了史籍典章所載的史實。黃河金石展示的是黃河流域勞動人民與黃河洪水作斗争的歷史，是開發利用黃河水資源的歷史，是與黃河抗爭不斷進行治理實踐的歷史，具有極其重要的歷史價值。